

特别  
推荐

追踪埃博拉

NATIONAL  
GEOGRAPHIC

WWW.NATIONALGEOGRAPHIC.COM.CN

本刊与美国《国家地理》版权合作

2015年7月号 总第157期

# 华夏地理

深藏山中无人识 **土司城**



追忆圣雄  
循着甘地的足迹

新地平线开启  
人类与冥王星的初遇

巨龙先生  
块头最大的食肉恐龙

ISSN 1673-6974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3-6974 国内统一刊号: CN53-1204/K 邮局订阅代号: 80-465 零售价: 人民币20元 港币30元



**土司城堡海龙国** 遵义市旧属播州，公元9~17世纪为杨氏所据，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存，海龙国即是其中之一。其坐落于遵义市



区西北约30里，三面环水，一面衔山，仅国之东西各有仄径可以上下，地势险绝，《明史》称其为“飞鸟腾猿不能逾者”。



摄影：马艳丽

【 深藏山中人未识 】

# 土司城

贵州·湖南·湖北



西南诸多地区时有叛乱，“盗贼”从未止息，朝廷为保疆土安宁，常以本地豪酋统之。蒙元势力进入之后，更将此定边之策制度化，在西南边疆地区广设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司，各司主官除朝廷委派的流官外，也大量任用本地豪酋土官，故名“土司”。

湖南老司城征集的“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印”



**新王宫复原图** 新王宫是一组以中央踏道为中轴线，依山形层层抬升，各抱地势，两侧屋宇栉比鳞次，檐牙高啄，廊道漫回，四周



环“宫”城墙蜿蜒曲折的庞大建筑群，占地近2万平方米。

供图：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任超编绘；前页印章供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齐政修教 因俗而治

撰文：李梅田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国子监名士顾彩开始了一个人的旅行，他的目的地是“广袤数千里，山环水复，中多迷津，桃花处处有之”的武陵之地。作为生于江南的名士，顾彩真正的兴趣或许并非陶渊明笔下“渔郎误入”的桃花源，他所寻访的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武陵苗蛮之地。这片土地对康熙年间的文人来说，应该是充满了吸引力的，在他们的政治语境里，武陵山区“谿峒深阻，易于寇盗”，但由于“官辙不可至”，中央政府对这里的控制可谓鞭长莫及，武陵山区想必也同“三藩”、“准噶尔”一样，常成为顾彩与同僚们议论的话题。

顾彩此行，缘于好友孔尚任的一封书札。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上演之后，一时名冠天下，倾慕者中包括蛮夷之地的容美洞主田舜年。田舜年虽居万山阻隔之境，但雅好文学，对孔尚任尤为倾慕，每宴必演《桃花扇》。当顾彩携孔尚任书札自江汉平原出发，翻越崇山峻岭来到容美时，田舜年以上宾之礼盛情款待。

顾彩逗留容美五月有余，在诗词唱吟、曲水流觞之外，更对这片帝国边疆之地的野风民俗进行了深度体察，他在游记《容美纪游》里对容美土司治下的政治军事制度、经济方式、社会生活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而对田舜年来说，与顾彩的接触不仅是文辞的交流，更代表了边疆地区土司文化与当时主流文化的接触。

顾彩所至的容美土司地区，在今湖北省鹤峰县，为巴人后裔土家族聚居区，也是西南地区众多受深山大川阻隔的“化外”之地之一。这些地区族裔繁多、风俗各异，地方豪酋各据一隅，自相君长。虽秦汉时已置郡县吏属、唐宋时又设羁縻州县，但在绵延数千里的广大西南山区，各地苗蛮时有叛乱，“盗贼”从未止息，朝廷为保疆土安宁，常以本地豪酋统之。

蒙元势力进入之后，更将此定边之策制度

化，在西南边疆地区广设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司，各司主官除朝廷委派的流官外，也大量任用本地豪酋土官，故名“土司”，土司制度在前朝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得以成形。

明代初年，继续沿用和发展了初具雏形的土司制度，但更成体系，各级土司衙署皆以本地豪酋担任世袭土官。

虽然明初国力渐强，经营西南疆土的愿望也甚为强烈，但对土司地区仍着重抚慰，而非用武，朝廷授以土司名号，听任自治，以保边地安定，而对土司而言，既可得朝廷官职，又可保世袭土皇帝之威权，此种相互利用之态是土司制得以存续数百年之根本。

土司之制，按《四库全书总目》的概括，属“不内不外”之制，“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实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项权宜驭边之策。

在土司制最为完备的明代，先后在西南山区授予大小土司称号数千，势力较大者有“湖广之田、彭，四川之谢、向、冉，广西之岑、韦，贵州之安、杨，云南之刀、思”等。朝廷对土司的控制方式是“额以赋役，听我驱调”，“假我爵禄，宠之名号”。土司有纳税、征调的义务，

但又保有相当大的自治权，有自己的军队、法律和习俗。但在有明一代，土司与朝廷的关系可谓若即若离，凡朝廷政清人和之时，土司“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但若朝廷中衰，对土司的统治也随之“威柄渐弛”。倘若土司势力过于强大，威胁到边疆稳定，朝廷必会以武力削除，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在万历年间，因平播一役而亡，即为此例。

不过针对土司的武力行动尚属个案，大部分土司存留到了清初，雍正年间全面施行“改土归流”，以往不入流的土官正式被朝廷委派的命官取代，土司子裔离散各地，延续数百年的土司制度正式消亡。

从元末至清初，土司制度在开发西南疆土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成了西南山地社会文化形态的转变。“改土归流”之后，土司制度成为历史的陈迹，曾经的城址、堡垒、要塞、关卡、宫殿、寺庙、水井、墓葬也被岁月淹埋，深藏于崇山峻岭的云雾之间。

考古学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对湖南永顺等地的城址、墓葬、关卡、宗教礼仪及经济设施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发掘，将以永顺老司城为中心的土司社会历史图景进行了揭示。

老司城是一座经过历代营建形成的以宫殿和衙署为核心，由街巷、市场、庙宇、墓地、军事要塞等组成的设施齐全、格局整齐的城池，延续八百年的土司遗存见证了五溪蛮夷之地社会文化转型，逐渐融入华夏文明体系的进程。

位于贵州遵义的播州杨氏与永顺彭氏一样，也兴起于唐末五代，南宋达到鼎盛，最盛时期的统治范围包括了乌江流域的贵州省大部。海龙囤遗址是播州土司的一处宋明时期的山城，始建于南宋初年第15世杨文统治播州时期，为抗蒙而建，选址于三面环溪的龙岩山巅，另设有数道关隘，地势十分险要，所谓“飞鸟腾猿

不能逾”，在国内开阔之地建有两组规模巨大的衙署建筑群。作为播州土司的主要军事防御设施，海龙囤见证了播州土司的盛衰全过程，最终毁于明万历年间的平播之役，海龙囤的沦陷意味着杨氏土司的覆亡。

湖北咸丰县的唐崖土司与顾彩所至的容美土司临近，地理环境和社会形态也较为接近。唐崖土司的统治者覃氏实力和影响远不及彭氏和杨氏土司，史迹极少见于文献。依据覃氏族谱，唐崖土司当始建于元末，至正六年（1346）年覃氏被始封为安抚使，至四世祖覃忠孝时，“奉命招抚蛮民……蒙兵部覆匙，敕部安抚原职任事，于永乐二年颁授左右二副司印，篆左苍蒲司官、右活龙司官”。

唐崖土司现存主要遗迹形成于明万历至天启年间，以张王庙、“荆南雄镇”牌坊、宫殿和衙署遗迹等为代表。“荆南雄镇”牌坊为第12代土司覃鼎于天启初年因战功受赐而立，当时覃氏土司实力达到鼎盛。唐崖土司城以牌坊为核心的衙署区与街道体系构成了“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落”的格局，城池三面靠山，一面临河，是一座蕴含了传统风水理念、随形就势而建的城市，一直沿用至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此后由于土司家族的离散而逐渐废弃。

土司文化遗产作为古代“齐政修教、因俗而治”治国理念的特殊实物遗存，生动地见证了土司文化融入华夏文化体系的进程。

在古代中原王朝的政治语境里，土司地区属地理上的边疆、文化上的“化外”，常以“蛮夷”、“盗贼”、“匪”、“讨伐”、“平定”等称之，但所谓边疆和“化外”，从来都是动态的概念，主要反映了地理和文化上的差异，鲜有民族差异的涵义。

虽然土司地区有着相对独立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族裔繁多、风俗各异，但在中原王朝的因俗而治下，皆不约而同地有着对中原礼仪制度、观念文化的吸收与认同，文化差异逐渐缩小，先后融入到多元一体的华夏文化体系之中。

---

李梅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参与唐崖土司城的申遗考古发掘与研究。



**飞龙关** 此关是从东面登屯到国顶的第一道关口，屹立在环形悬崖上，为明万历年间杨应龙所修建。整体平面格局像“四”字形，

# 风雨海龙囤

公元9~17世纪，播州为杨氏所据，  
世守其土达724年，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存，  
坐落于遵义市区西北约30里湘江上游地带的海龙囤即是  
其中之一。其所在山峰相对高度约350米，  
三面环水，一面衔山，地势险绝。它始建于宋宝祐五年（1257）  
的抗蒙期间，毁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平播之役。  
这是一处集保卫国家利益与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融关堡  
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羁縻·土司遗存。

与大门相对方向有一块长2米宽1.4米的石板，雕刻有窗花，在森严中增添了一丝魅力。

供图：遵义市汇川区委宣传部

公元1600年春天，一场血战在中国西南边陲开满杜鹃花的山野里激烈上演。八路并发的24万明军将土司城堡海龙囤围得水泄不通，一时矢石如雨，血水横流，满囤哭声，震动山谷。五十余天后，明军终于破囤而入，一举翦灭此前一年起兵反明的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及其党羽，从而结束了杨氏在播州724年的统治。海龙囤在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这场战事，正是史称“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播之役”。《明史》载：“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匱”。有史家认为，三大征令明廷元气大伤，是致其灭亡的重要原因。

这是怎样一座城堡，虽偏处西南一隅，却与国运息息相关？

海龙囤雄踞于今贵州省遵义老城西北约30里的龙岩山巅，旧称龙岩囤。这里一带孤悬，群山固结，南北环溪，阴深峻险，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上下。杨氏统领播州时，筑囤其上，环山垒墙，东西设关，遂成“飞鸟腾猿不能逾者”。

唐末，播州为南诏所陷，僖宗乾符三年（876），杨端应募入播。

自唐末至明末，从杨端到杨应龙，杨氏统领播州达724年之久，传27代30世。自杨端入播，“杨氏居播十三传，至桀始大”，杨桀曾作《家训》十条，第一条便是“尽臣节”。

公元13世纪，逐渐强大的蒙古在先后消灭西夏和金后，与南宋开始了正面冲突，其所采取的由西而东迂回包抄南宋的“斡腹”之谋，

宋宝祐五年（1257），已得大理的蒙军向东挺进逼近播州，情势紧急，杨桀孙杨文上报朝廷，其在1242年提出的“保蜀三策”中“择诸路要险，建城濠以为根柢”防御理念被采纳，理宗遣吕文德入播协助防务，商议“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由杨氏的政治中心穆家川（今遵义老城）至“诸险中为最”的海龙囤凡30里，由海龙囤去“万峰插天，中通一线”的娄山关约40里，恰是步卒行军一日的距离，于是筑“龙岩新城”，即后之龙岩囤，即海龙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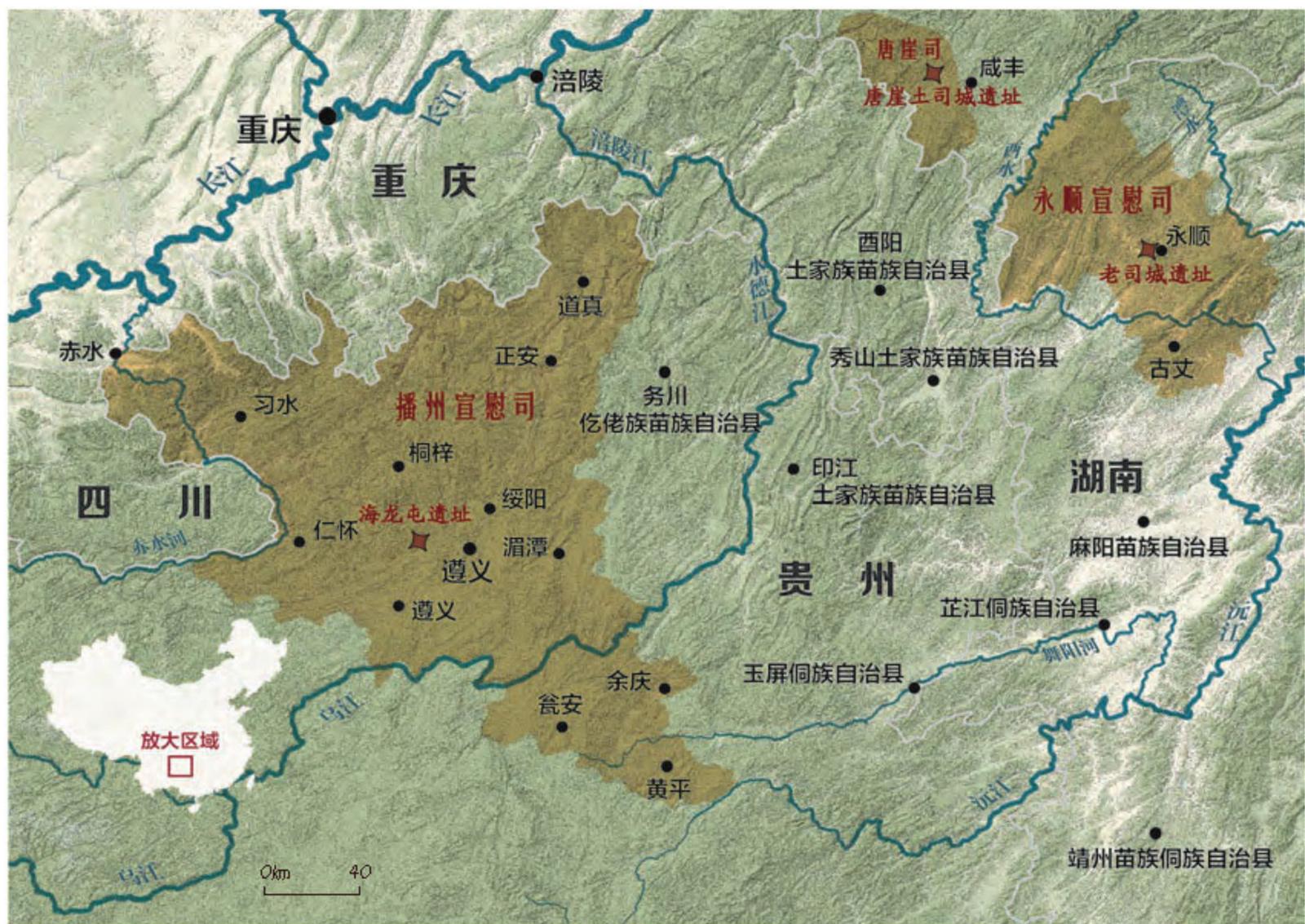
然而蒙军的铁骑尚未践及海龙囤，江山便已易主。

元明时期，杨应龙的先辈是否曾修葺海龙囤，文献无载。万历年间，杨应龙主播时，对海龙囤进行较大规模的修整与加固。并于囤前筑九关，今飞龙、朝天、万安关上杨应龙手书



**螭首金杯** 杨价墓位于遵义市新蒲村，为南宋时期播州第14世土司杨价和他的夫人田氏合葬墓，是杨氏墓地少有的土坑木椁墓。墓葬的规格很高，就连棺材上使用的抓钉，都是用黄金和白银制作，出土80余件精致的金银器及玉器，这件精美绝伦的螭首金杯就出土于杨价夫人墓室。

供图：贵州省文物考古所



**土司地域图** 在土司制最为完备的明代，朝廷先后在西南山区授予大小土司称号数千。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湖南永顺彭氏统领的永顺宣慰司、湖北咸丰覃氏统领的唐崖司及贵州杨氏统领的播州宣慰司。

石匾尚存，其中“飞龙关”的落款为“皇明万历丙申岁”，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杨应龙在《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围严禁碑》中称，其重修海龙囤的目的，是欲使之成为“子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

谭其骧说播州杨氏：西南夷族之大，盖自汉之夜郎，唐宋之南诏、大理外，无出其右者。杨氏统领播州的数百年间，恰是中国少数民族制度由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流变之际，羁縻之治和土司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世袭统领播州的杨氏，能“累世恪守忠节”，与中央朝廷保持一致，因而得到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客观上促进了播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明清时期遵义地域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海龙囤是在抗蒙背景下由中央王朝和地方

势力共同兴建的防御工事，代表着国家意志，是一种国家行为。但海龙囤自始至终也没有成为抗击蒙军的前沿阵地，却在343年之后，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对抗的主战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司制度弊端逐渐显现。播州杨氏虽版籍列于职方，然专制潜力，自相君臣，赋税之册，不上户部；兵役之制，不关枢府，名为外臣，实为一独立政权。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举兵反明，成为明朝朝廷翦灭的对象。

万历二十八年（1600）二月，总督李化龙率八路大军平播。农历四月十六，杨应龙仓皇退守海龙囤。四月十八，24万明军合围，环而攻之，却长攻不下。总督李化龙感叹：“囤即险绝，岂真天造地设，人迹所必不能到者乎？”囤外，二十余万官军筑起长围，轮番攻战，昼夜不息；

国内，数万军民背水一战。六月初六日，明军攻破海龙围，杨应龙自缢，杨氏对播州的统治随之灰飞烟灭。

海龙围是融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与保卫国家利益于一体的宋明时期关堡山城体系，至今完整而真实地保留着明末废弃以来的面貌。围前铜柱、铁柱、飞虎（三十六步）、飞龙、朝天、飞凤六关依然笑傲群山；被明军攻破的围后土城和月城里仿佛还回荡着四百年前的杀戮之声；围内“老王宫”、“新王宫”、“金银库”瓦当上的莲花还在绽放；环围约6公里的城墙上芳草萋萋，藤蔓青青。但是，更多或悲壮或凄美的细节，已经深深掩埋在时间的尘埃下。

2012年4月23日至2013年1月22日，为助推海龙围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对海龙围展开了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科学发掘，这是我个人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次田野考古经历，275天，围的颜色，从红色到绿色到黄色到白色，不知不觉变幻着。

## 【海龙围前传：养马城】

当地乡谚曰：“先有养马城，才有海龙围；有了海龙围，才有遵义城。”乾隆《贵州通志》则更为明确地说：“养马城，在遵义县北三十里，唐末杨氏建为牧马地，可容马数万匹。”若所记可信，而海龙围又确系宝祐五年（1257）始建，则养马城早于海龙围。

好多次，在海龙围遥遥地看围东3公里外的养马城。顺着指引者的指尖，“光秃秃的那片就是，你看，绿色的一道就是城墙。”

终于，在抵围近一个月后，我第一次登上了养马城。

出铜柱关，伴着潺潺溪水，顺白沙河而下，又沿窄窄的山路蜿蜒而上，汽车在几户人家前停下来。带路的葛乾江说：得找个人，我也找不到。他正在吃饭的表姐夫兰晓兵没有推辞，领着我们，走过一段石板铺成的古道，走向养马城东城门。

从海龙围到养马城，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

具，我们仅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同样一段路，412年前的同一季节，明军却走得十分艰辛。

养马城是播州以海龙围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中的一道重要屏障。《平播全书》中说：欲破海龙围，须待各路兵马尽至，合力围攻。但“养马城为围藩篱”，且“四面深管”，必先剿灭，方能形成对海龙围的合围之势。足见养马城的重要战略地位。

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平播之役中，农历四月初三日，明军与播军首次在海龙围短兵相接。当日，杨应龙统兵数万袭杀率先攻入娄

---

## 海龙围是融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与保卫国家利益于一体的关堡山城体系，至今完整保留着明末废弃以来的面貌。

---

山关的刘綎部。此前累战皆胜，意颇自得的都司王芬等，视敌若无，其营地远在大营前，遂成首冲之地，不幸战死。刘綎闻讯，亲率骑兵来救，播军溃逃，杨应龙几乎被擒。明军一路猛追，至养马城而还。四月十一日、十七日，总兵马孔英率兵两袭养马城，斩杀及生擒数百余人。四月十八日寅时，明军对养马城发起总攻，当日即破城。从养马城到海龙围，数公里之遥，从四月十八到六月初六，明军用了49日方完成了今日一小时的行程。

东城门至今仍是沟通城内外的一条重要通道。兰晓兵说：我们就叫它城门，没有名字。穿过东城门，一片平阔的田野和点缀其间的人家扑面而来，令人感觉这确实是一座城。这处传说中的“牧马地”，处处显示出与海龙围的不同。养马城建在一处群山环绕的山巅小盆地上，城墙沿山脊而筑，如蛇蜿蜒，周约五里；山峦相接的低洼之处，则筑以城门，共六道。城内现为水田、耕地和村落，当年的建筑已荡然无存。养马城的

地势称不上险峻，城墙亦非高不可攀，且关隘狭小，所以一日即为明军所破。平播之时，养马城是一处与周边海龙囤、养鸡城、养鹅池等互为犄角的军事城堡，显非牧马之地。但尚不能据此否定其在更早的唐代确曾为杨氏牧马地的可能性。

文献记载和关隘（飞龙、朝天）上尚存的铭文，均表明杨应龙曾对海龙囤进行过较大规模的重建。重建的重点是囤前九关，其目的是为了“拒官军”。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海龙囤绝大多数关隘是明代遗物。而囤南北两侧土石混筑的城墙及后关土墙，其所用材料与关隘（以及与关隘相接的石墙）则判然有别，其年

---

### 万历二十八年的平播之役中， 养马城是一处与周边海龙囤、 养鸡城、养鹅池等互为犄角的 军事城堡，显非牧马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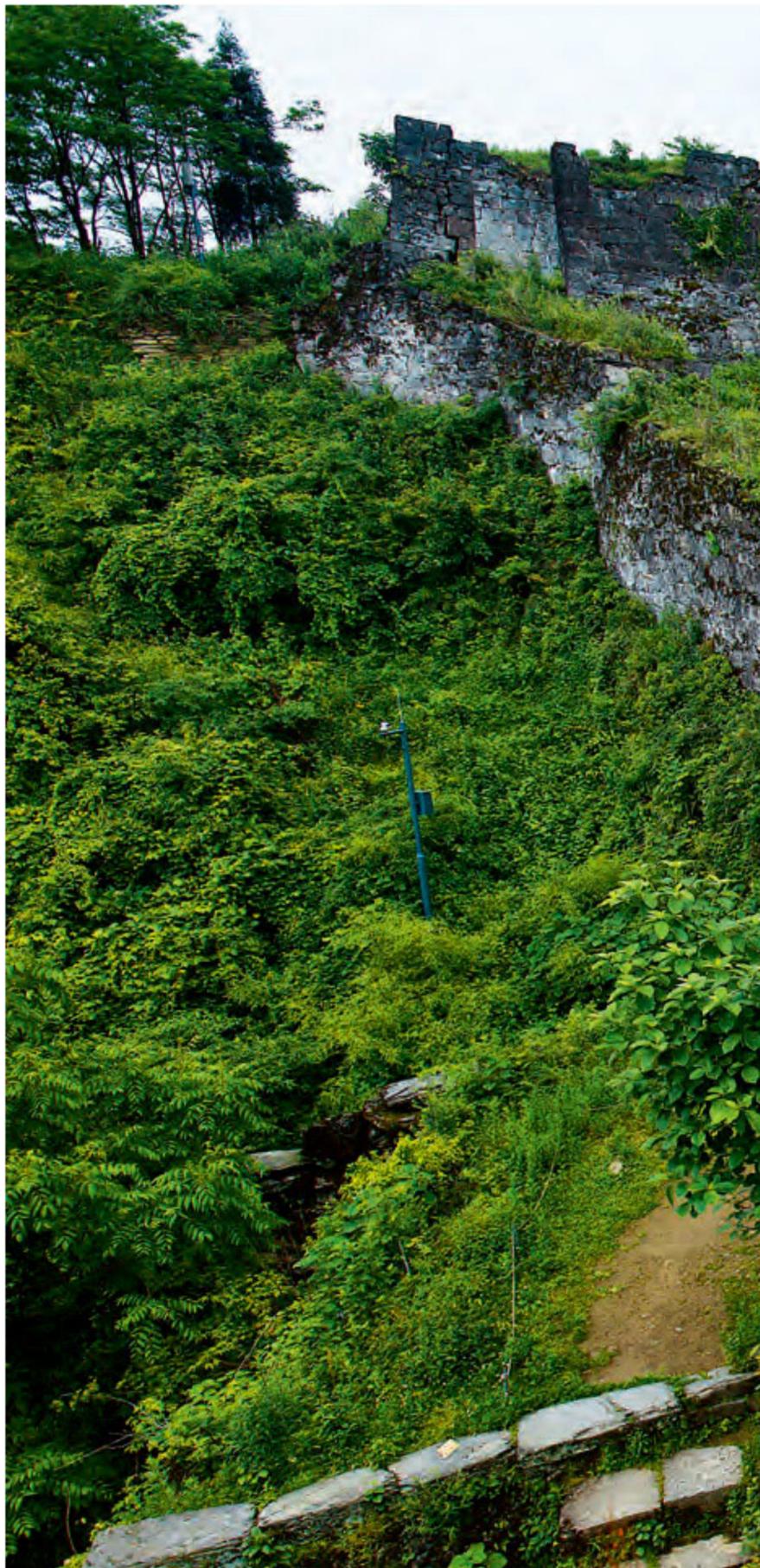
---

代应早于明万历时期。养马城的城墙与之相近。养马城六道城门中仅一道为圆拱形，余均叠涩顶，且城门狭小，反映出技术的古朴。这些可供观察的事像，都有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现存的养马城早于海龙囤。

若没有兰晓兵的指引，我们不能寻见所有六道城门。因为如今除东城门和中南城门尚在使用外，其余城门多已被封堵并掩于荆棘、杂草之下，很难发现。相对于海龙囤，我们对养马城所知更少。可从养马城，我们仿佛看到了海龙囤的过去，我宁愿相信，这确是一处唐末的牧马之地。试想，若没有细致的实地踏勘或在周边的经营，杨氏又岂能在宝祐五年（1257）欲“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时，一下便发现和选定险峻的龙岩山的？

### 【从老王宫到新王宫】

民间传说海龙囤上有三十六大街七十二小



巷，囤内建筑栉比鳞次，气派辉煌。

四百多年后，海龙囤上环囤城墙、囤前六关、囤后三关等历史遗迹，历尽风霜仍傲然屹立；囤内建筑则大多掩于灌木、杂草和黄土之下，已难一睹真容。

这是一座建立在险峻山巅的城。1257年筑“龙岩新城”的目的，是“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既作此打算，则选址必险，建筑必坚。而既称之为城，必是按照宋城的一般范式来营建



**朝天关** 朝天关的“朝天”二字名副其实,关口面东,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朝天关与飞凤关紧密相连,相互照应,是东面进入囤顶的倒数第二个关口。

的。这一点可以从宋代筑城的指导性典籍《武经总要》中得到验证,海龙囤的诸多做法与之契合。此后宋祚移于元,又移于明,直至万历元年(1573)杨应龙即宣慰使位后,对海龙囤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此番重建,用杨应龙自己的话说,“以为子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耳”,因此不惜代价。民间传说,建国工人每日必须穿破三双草鞋,否则性命不保。

1999年秋,一支由多部门组成的考察组进

驻海龙囤,展开系统调查。考察组结合考古发现和民间传说,大致确定囤内老王宫、新王宫、金银库、兵营、瞭望哨、采石场等遗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老王宫为宋代建筑群,新王宫为明代建筑群。

老王宫和新王宫,是当地村民对囤内两组最大建筑群的称呼。囤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两道西南-东北走向的冲沟将囤顶分割为三块。南块地势通仄,中块开阔,北块内又有若干小



摄影：马艳丽

### 就近取材

新王宫的脊兽（右图）俱用泥土烧成，均粗犷大气，望之令人生畏。而考古发掘证明，包括砖瓦在内的各种建筑材料均就近取材，避免了远距离运输造成的不便。



冲沟交错，地形复杂。老王宫即坐落在中央板块上，新王宫居其北，彼此相距约200米。

传说老王宫为白龙太子的居所，白龙太子是播州大盗，在此前后住了十八辈，后来被杨应龙的祖先打败。新王宫则是杨应龙的宫殿。由于老王宫缺水，才新建了新王宫。因此，白龙太子早而杨应龙晚，老王宫早新王宫晚。又传说，杨应龙就是白龙太子的化身。当地民间做道场时，道士先生还偶尔会唱到白龙太子。64岁的王武志说：“只晓得白龙太子是管天、管白雨（冰雹）的，祭了他么就不落白雨了。”

我初闻此故事，权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以为意。后来翻检文献，发现这种说法至迟在明晚期便已出现，才意识到事情似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中引旧志称：“海龙囤，为杨酋穴垒……故老相传，昔白龙太子据此。”曹学佺万历三十七至四十一年在蜀为官，其《蜀中广记》可能成书于四川任上。据此，白龙太子的相关传说至迟在万历晚期便已在当地流行。

根据“故老相传”，则先人于龙岩山“据险立寨”的历史，至迟可推至唐乾符年间（874～879），而非“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的宝祐五年（1257）。而老王宫若确系白龙太子的居所，则其年代亦当早至唐末。

实地踏勘，老王宫内建筑基址分布颇广，面积在2.5万平方米左右，但仅有裸露于地表的少量石砌建筑台基、柱础和踏道可供观察，因此尚不能推断其到底是唐代还是宋代建筑。

与老王宫相比，新王宫的建筑基址保存较为完整，海朝寺前的石砌踏道规模可观。在二十余天的调查和清理工作中，我们发现了环新王宫的城墙，进而确定了新王宫的面积，“宫”内格局也慢慢清晰起来。

我宁愿相信新王宫是一组经过严密规划、一气呵成的宏伟建筑，而非几个不同时期拼凑而成的衙署。或者，一开始所制定的完整规划，得到了后继者一以贯之的严格执行，所以呈现出严整的布局，残存至今的废墟亦掩盖不住它缜密的规划。



**新王宫遗址** 新王宫为明代建筑群，初步推断是杨应龙最后的住所，毁于大火。发掘显示，新王宫的建筑基础清晰可见，有衙署、“寝



宫”、府库、庖室、书房及役人之室，现存地面建筑海潮寺为后世所建。

初步发掘显示，这组宏大建筑，有环宫的城墙，以中央踏道为中轴线，屋宇因地就势，沿山脊层层抬升，器宇轩昂，气象万千。雄伟的石砌台基略呈“品”字形展开，中央轴线上建筑可能为衙署，后端可能为“寝宫”，两侧则可能为府库、庖室、书房及役人之室。中央建筑有墙体与两侧屋宇相区隔，现可辨明两组，一组居前，地势宽敞，被后之海潮寺所据，可能是围上最高行政建制总管厅旧址；一组居后，为一面阔五间的大型建筑，其明间后部砌一石台，须弥座，传其上原有石雕龙椅，毁于1958年，“龙位坪”因之得名，可能为土司议事处。中轴

---

### 传说杨应龙有条赶山鞭，能驱石上山。每当夜深人静，鸡不鸣犬不吠时，挥鞭抽石，石如猪奔，城堡很快筑就。

---

线左后侧建筑尚存五级相连的高峻台基，其中中央有踏道贯通，当地人称“三台星”。须弥座风格的石构件，便捷而隐蔽的交通，彰显了它非同一般的地位。初步推测这里应为杨应龙的“寝宫”。中轴线右后侧，紧贴西南段宫墙处，另有一组建筑略与“三台星”对称，可惜残破较甚，格局不明，可能为营房或另一组“寝宫”。中轴线两侧的建筑或为单栋的屋宇，或为带有天井的成组建筑群，曲廊迂回，错落有致。宫内排水设施整齐划一，有暗渠将水顺山势层层引向低处，有的至今仍发挥着良好的功能。宫内道路彼此贯通，四通八达。

新王宫东、南、西、北三面有土石混筑的城墙环绕，保存较好者宽约2米，残高0.5~1.5米。解剖发现，城墙外侧堆积中有瓦砾并完整板瓦，推测墙头本覆以青瓦。北墙与西墙交接的西北端，有一组曲尺形建筑，疑为角楼，其外紧邻的“金银库”可能为军营。经初步清理，

发现大量莲花瓦当、缠枝纹脊砖、脊兽碎片等建筑构件，以及由八边形柱础和地袱石、台基等纵横连接而成的房屋基址。其中出土有“大明宣德年制”、“大明万历年制”等铭款青花瓷器，清晰表明新王宫确系一处万历时仍在使用的建筑群。新王宫以规整大石筑成房屋台基，或雕琢成直径达40厘米的柱础石，局部用石板铺砌地面；以砖砌墙或墁地；以瓦苫顶，檐端莲纹瓦当流动成一串动人的韵律。四十多岁的牵马人陈显伟说起几年前在围上自家地里捡到一件脊兽时，似仍惊魂未定：“是个龙脑壳啊，几多大，中间是空的，塞得进一个拳头。嘴巴张开，两个鸡蛋大的眼睛盯着你，看得人怕。藏在床下，也觉得阴风惨惨。后来50块钱卖了。”从这略带夸张又饱含敬畏的描述中，不难想象王宫当年的瑰丽辉煌。

从《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围严禁碑》看，海龙围上至少有总管厅、书房、仓库、军营等设施，土司本人并不常住围上，仅偶一亲临。因此，风景秀丽的海龙围，除却是一处防御严密的军事屯堡外，可能还是一处避暑消遣的离宫别馆。万历二十八年（1600）农历六月初六明军破围后，曾经富丽堂皇的“宫殿”，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如今只留下残垣断壁、满地灰烬、龟裂的石材、半灰半红的砖与瓦和胶结变形的瓷器等，供我们去推想当年的细节。

### 【石料砖瓦之来路】

海龙围是一座用石、砖、瓦、木修筑起来的山巅城堡。其中，石材的使用最为广泛，关隘、城垣、屋基、台阶、柱础及窗户等无不用之。

传说杨应龙有条赶山鞭，能驱石上山。当夜深人静，鸡不鸣犬不吠时，挥鞭抽石，石如猪奔，城堡很快筑就。但从文献记录看，应龙之重建海龙围，至少持续了七年以上的的时间，并非使用赶山鞭一蹴而就。

老王宫后有一石山，地势高敞，石上隐隐有凿痕，其西南有大片凹地。此处俗称“窝坑”



**古老筑城工艺** 石头是海龙国使用最多的建筑材料，古代匠人先凿好楔眼，并将铁楔置于其内，用大铁锤来回锤击，从而得到规整的石材。如今修复城墙的工匠，其石材的开采工艺与数百年前大致相同。

的地点，是先期调查者认定的“采石场”，它较好地解释了海龙国上石材的来源。有人甚至认为，正是在此采石，破坏了国上风水，才使得杨氏最终走向覆灭。

我们请来了地质专家，从岩石分类上进一步确认了石之来路。海龙国各关隘及新王宫所用石材，以泥灰岩为主，次为粘土岩，另有少量砂岩。这些岩石在海龙国上都能找到对应者，可以肯定，国上建筑石料均应是就地取材。对“采石场”局部清理，发现开采石料所遗的各类楔眼一百二十余个，其形状、大小，与“新王宫”部分石材上所遗者可完全对应。至此，可以肯定地说，“新王宫”内的相当部分石材当取于此。当然，国上采石场可能不止一处，比如龙虎大道的开凿，既解决了道路交通问题，也部分解决了飞龙、飞虎诸关及相连城垣的石材来源，它本身就是一处采石场。三十六步西南的夹岩

窝一带，晚近仍有人取石于此，据说采石时曾得见古人采石痕迹。海龙国上遗留至今的许多石材颇为厚重，经测算，海潮寺前踏道上一方长达2.55米的巨型条石，重量达2.5吨；而重逾一吨的石材，在新王宫内所在皆是。相对于开采而言，运输可能更显困难，一种由高处向低处借助特殊工具，并佐以水泼地加以润滑等方式进行拖曳的运输策略，被认为是最可取的。

在另一版本的民间传说里，杨应龙暴虐异常，修国者每日须穿坏三双草鞋，否则将被视为偷奸耍滑而被投下杀人沟。这一传说，应该更接近真相。筑国时，匠作人役的使用，人数一定不少。《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国严禁碑》：“来往工匠人夫，但遇进关者，龙凤关把总审查的实何项人役，给帖照身，各关验放。到国，赴总管厅缴帖、上名、应役。役满工完，仍赴总管厅告乞水帖出关”。其中，必定就包括大量石



## 土司文物

根据器底年款，贵州海龙囤新王宫遗址内所出青花最早的产于明宣德年间，最晚的则在国被攻陷的万历时期，此外还有成化、嘉靖、隆庆时期的器物。其中绝大部分是民窑器物，还有一些官窑瓷片，以嘉靖时期的为多（中上），只有数片万历官窑。杨氏土司统领播州十三世724年，势力强大，杨价墓出土的金台盏可见其经济实力（中下）。而在湖北唐崖土司城内，专家们不仅发现并确认了大量土司时期的遗存，而且发掘出土大量文物。既有工艺精湛、等级较高的建筑构件，也有产自景德镇官窑的精美瓷器，还有彰显土司等级和战功的印章，唐崖土司城出土石缸（右上）十分精美，而清代咸丰地方官吏官服（右下）和清代咸丰城隍庙木雕“独占鳌头”（左图）也显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和中原文化已经深入渗透到西南山地的每一个角落。



供图：贵州省文物考古所（金台盏）；唐崖土司城遗址管理处；摄影：马艳丽（官窑瓷片）





匠。从发掘情况看，石材是被运至建筑工地，才进行深加工的，因为我们在铺地的砖、石下，发现厚厚一层从整石上凿下的碎石屑。

围上石料就地取材，木材亦应采自附近。所需的大量砖瓦来自何处？传说海龙围所用砖瓦是在金川窑和海龙坝烧造的。为了运送这些砖瓦，杨应龙一次动用军士三万，从金川窑、海龙坝沿山川河谷逶迤一线，人手相传，将百万砖瓦运抵海龙围巅。

事实果真如此吗？调查发现，老王宫南侧今王武志家周边一带有窑址数座，我们对其中一座进行了清理。其内出土较多砖屑，类型及尺寸与新王宫出土的长方形砖、薄长方形砖全同，部分断砖上有“十六”铭文。这是一座明代砖窑无疑。围东五里太平亦发现窑址，形制与围上发现的完全一样，难能可贵的是，居中的一座窑址的底部散布着大量砖屑、瓦砾和瓦当，均与围上所见者相同。当地人说早年修路时，曾掘出脊兽。这些都表明，海龙围在营建之初，均就近取材，其所需砖瓦，就是在海龙围及其周边近便之地烧造的。

### 【雾锁雄关】

海龙围因山取势，建于陡绝的险峰之上，其南、北环水，下临深渊，山顶平旷，仅东、西两侧有仄径可供上下。海龙围上现存关隘九重，围前六重，围后三重。围前者自下而上分别为：铁柱关、铜柱关、飞虎关（三十六步）、飞龙关、朝天关和飞凤关。围后者自外而内为：后关、西关和万安关。托天之福，遗址南北侧临渊而筑的约6000米城墙保存完整，其内侧的敌楼、包围马道等尚有迹可循，东西两侧的诸关隘尚存雄伟之势，城内建筑虽已毁于万历年间的“平播之役”，但基础尚在，格局清晰。

海龙围选址合理、设计独特、建造灵活，

军事防御体系完整。它雄踞龙岩山上，地势险峻，在四围斩绝的天然形胜之处筑城，且前有铁柱、铜柱、飞龙、飞虎等关拒敌，后有双重瓮城防御，飞鸟腾猿不能逾。海龙围城堡不规则的形状、独特的建筑构造、城墙及各个关卡和山地地形的完美融合，充分体现了设计和建造的独具匠心；重要部位构造独特、雕刻艺术精湛，是古代“因山为城”的优秀实例；其关口、三十六步天梯等反映了精巧的设计构想和杰出的军事防御理念。

海龙围作为关堡结合的山城体系，充分利用地形，又融入地形，将山体作为防御体系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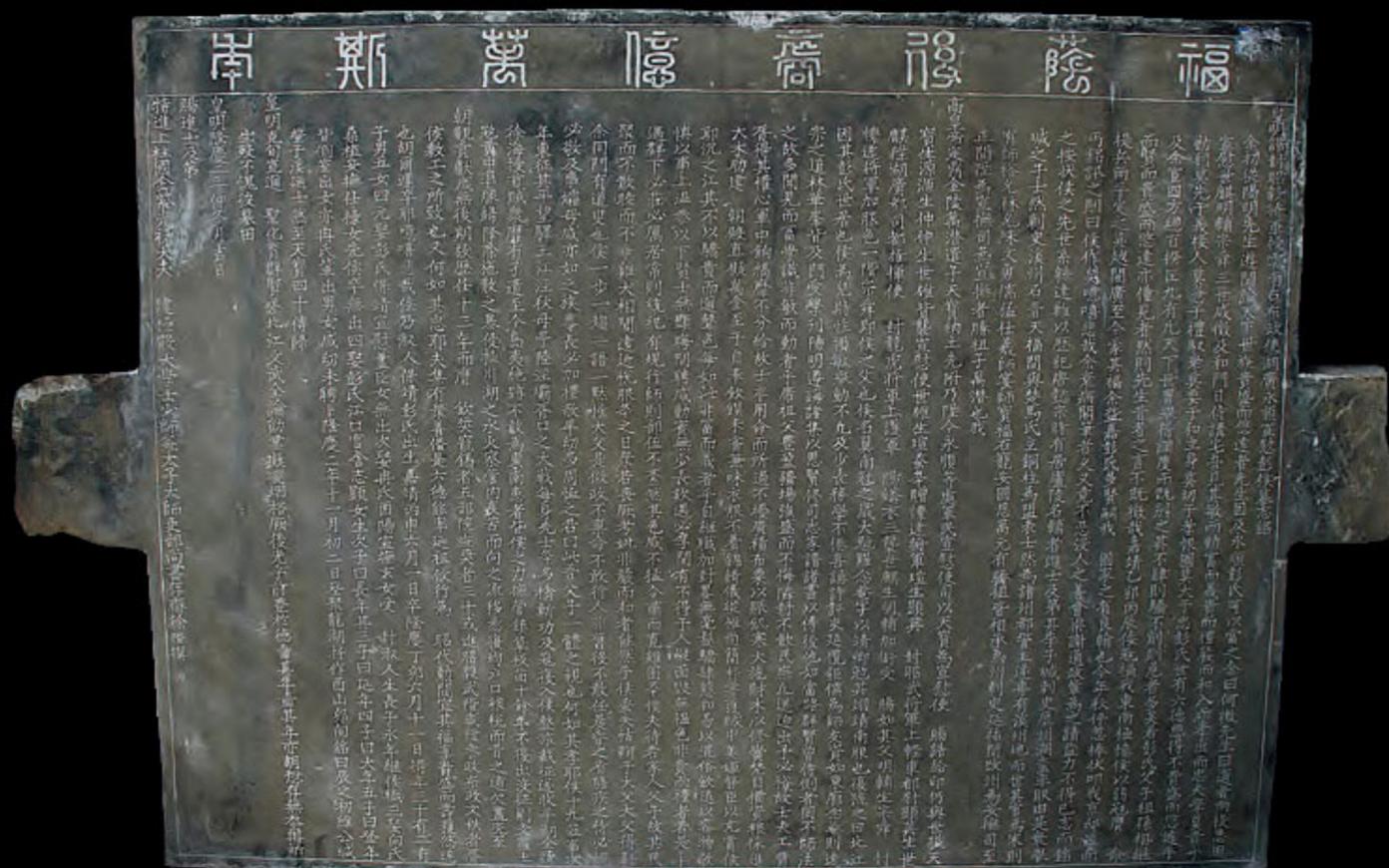
### 海龙围上现存关隘九重，包括铁柱关、铜柱关、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后关、西关和万安关。

---

组成要素，攻防结合、寓攻于防，形成层层设关，关关相卫，唇齿相依的防御体系；既是山地军事攻防建筑的杰出典范，又是宋元明时代社会动荡的实物见证。

海龙围是唐宋羁縻之治的产物，在南宋抗蒙战事中成为一道威慑敌人的屏障，是明末“平播之役”的主战场，它见证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由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历史性变迁；反映了播州内部的阶级冲突、民族关系以及土司与朝廷的关系，因此成为宋明时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实物载体。发生在这里的“平播之役”，使西南地区除汉之夜郎、唐宋之南诏、大理外，势力之大无出其右者的播州被“改土归流”，对中国西南政治版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快了明代国家化的历史进程。

**飞虎关** 因其下有三十六级石阶，又称“三十六步”。每级阶梯约60~80厘米高，明军攻围时，围上士兵将巨石、滚木等物扔下阻挡攻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 老司城故事

撰文：郭伟民

“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清人彭施铎的这首《竹枝词》，形象地记录了老司城极度兴盛时期的情景。永顺老司城遗址位于湖南省永顺县城以东19.5公里的灵溪河畔，为历史上永顺土司数百年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也是湘鄂渝黔土家族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情况最好的土司城址。

老司城的建城要追溯到宋代。清代《永顺县志》记载，彭福石宠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袭职土司之职后，常感其治所的地理位置在下溪州，易受辰州约束，于是迁其治于灵溪之福石山。虽可能早至宋代已经建城，但宋元时期，这个城并不大，也并未显出繁荣景象。它的浮华盛世是在明代，号称“城外三千户，城内八百家，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正如彭施

铎所描述的那般盛景。

老司城遗址以中心城址为核心，外围其他遗存沿灵溪河两岸分布，具有整体松散但局部集中的特征。中心城址的遗存沿各级台地随形就势分布，呈现出山地聚落形态。

中心城址范围约19公顷，主要建筑朝西南，依东北高、西南低的地形随形就势而建。可分为生活区、衙署区、墓葬区、街市区、本地族



### 湖南土司出土文物

湖南永顺出土的永顺宣慰使彭宗舜墓志（左一）；湖南永顺老司城征集瓷盘（左二）；莲花座墓地出土的鎏金银嵌宝石手镯（左三）；石堤西坝湖彭弘海墓地出土的乌立珠头金簪局部。



群信仰区、中央文教区等，各区域以正街、河街、右街、左街、紫金街等形成的道路系统连通。其中生活区、衙署区为中心城址的核心区域，均由墙体围合。

根据目前发现的资料，老司城遗址年代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现存贵族生活区、衙署区城墙建筑以前。年代下限为明代初年，年代上限为南宋绍兴五年（1135）。

南宋或元代老司城是否是彭氏土司的司治所在，一直是多年考古发掘所关注的问题。通过解剖生活区南城墙，发现在城墙填芯土中有灰砖、瓦当和明代早期的瓷片，在城墙下的文化层中，出土了宋元时期的白瓷片以及花纹砖、筒瓦等建筑构件。表明在明代早期以前，老司城已经有很长的居住过程，而且有高规格建筑的存在，所以地方志上彭福石宠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修建老司城的记载，很可能是信史。

第二阶段：现存生活区、衙署区城墙及相关

设施的修造与使用时期。年代从明代早期到清雍正五年（1727）的改土归流。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老司城生活区城墙修建于明代早期，衙署区及老司城周边的大量相关建筑也大多修建于明代，如彭显英建猛峒别墅；彭世麒建颗砂行署；彭明辅建谢圃公署；彭宗舜筑壶窝别墅等。从目前已发掘的紫金山墓葬和周边墓葬的资料看，年代最早的是土司彭显英夫人墓。彭显英袭职在明天顺、成化间。老司城周边石刻题铭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

根据遗迹的叠压关系和出土物，目前可将已经发掘的生活区遗存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始于明早期至明代中期。典型遗迹包括：生活区城墙、城门、主体建筑群，在地层中出土“宣慰使司佳器”的黄釉瓷，为明代早期景德镇民窑产品。也出土了“永乐年制”、“宣德年制”题款的瓷片。

后期：明代中后期到清雍正五年改土归流。

供图：永顺县老司城管理处（彭宗舜墓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老司城城墙** 老司城东、西、北三面城墙保存较好，一般残高1~2米，西北部一些地方高达6米，墙体以岩块、大卵石块垒砌，并以石灰、桐油等胶结，异常坚固，尽显土司宫城的恢弘气势。

典型遗迹包括生活区内部建筑扩建部分，相关建筑、建筑保坎和其它遗迹，出土的瓷片绝大部分的题款为“成化年造”、“大明成化年制”。

据地方志记载，老司城明代建筑中的一部分毁于清初流寇兵燹，老司城的城池因此受毁。

清朝建立到雍正五年永顺土司的改土归流的八十多年，是土司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在老司城及其辖区，有不少清代遗址和墓地，是研究这个时期历史的重要材料。

老司城出土的碑刻和周围的石刻题铭数量非常可观。碑刻分为墓志铭、买地券、纪事碑、功德碑等几类；崖壁上的题铭主要包括老司城灵溪两岸题铭、把竹河石刻和颗砂别墅附近的一些题铭，内容都直接与土司的活动相关。时间跨度从明代弘治年间到清代的嘉庆年间，主要集中在明代弘治、正德、嘉靖时期。改土归流以后，除了个别寺庙的纪事碑外，其他内容的碑刻就很少见到了。



第三阶段：雍正五年（1727）改土归流以后。改土归流，是把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直接管理。开始虽带有“强制同化”的色彩，但从客观上说，仍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做法。雍正二年（1724），土司彭肇槐把衙署迁移到土地肥沃、地势平坦的颗砂，称新司城，原来的城址就成了旧司城了。改土归流后，永顺新城廓未建的过渡阶段，郡守、邑宰也驻扎在新司城。雍正五年（1727），彭肇槐自愿改土归流，次年，

摄影：马艳丽

回到祖籍江西吉安老家立产安居。

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出于对老司城深险环境的担忧，并没有将永顺新城建于老司城，而是另选新址，即现在的永顺县城所在。

由此，老司城作为军事性质的城池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不再有大的营造活动。旧的建筑街市被继续沿用，但无力重修，旧的建筑倒塌了，变成废墟，或者其旧址上重修简陋的民宅。一些民居侵占了原来的道路，有些房屋建筑的地基、墙体多沿用前代，改建部分则明显变得粗糙、简陋，建筑的规格也大不如以前。出土物显示，清中期以后，精致的外来瓷片绝迹。原先依靠政治因素繁荣起来的老司城失去了原来的基础，殿堂、街巷一时失去了往日的繁荣而返回到它的出发点。

老司城东南的山坡上，埋葬了明代彭翼南祖孙数代土司家族。此处墓又被称为紫金山。紫金山墓地整个陵园的地表由墓葬封土、拜台、“八字”山墙、花带缠腰过道、南北神道及石像生、照壁等遗迹组成。墓室多为一个主墓室和两个侧室，当是放置土司及其夫人的地方，墓葬内以砖砌成，砖上雕刻极为精美，显示出高超的技艺。墓内随葬品虽多次被盗，但从盗墓者手中追缴的文物可以看到随葬品的精美，包括金花、金簪、发插、耳环等各种金银饰品。

彭世麒、彭宗舜、彭翼南都是永顺土司中功勋卓著的人物，他们曾带领土兵抗击倭寇，战后，朝廷敕赐彭翼南三品服，授为昭毅将军。

明嘉靖某年腊月，土家人正热热闹闹地准备过年，突然朝廷下令征调土兵赶赴东南沿海抗倭，根据行程计算要按时到达指定的地点，也就无法过年了，为了让马上出征的官兵也过上年，土司决定提前过年。抗倭大捷之后，为了纪念这次征战胜利，每逢过年土家族人都要提前一天，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过年的习俗。

郭伟民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先秦考古、文化遗产保护。



**双龙首银手镯** 永顺老司城遗址东门北面紫金山墓地共有历代土司王及亲属墓冢 109 座，但考古发掘几乎未出土随葬品，这件双龙



首银手镯是公安部门从盗掘者手中追缴的。

供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唐崖覃氏土司城

撰文：陈飞

覃国安常说自己是唐崖土司城内的唯一皇族，有家谱为证，他是唐崖土司第二十三代后裔。由于排行老大，大家都习惯称覃国安“覃老大”。改土归流后，土司举家迁往汉阳。迁徙时，老祖曾交代留守墓地的人：世代看守，传守土司墓地位置的秘密。于是，覃氏后代就世代生活在土司城内官坟山下，守卫着唐崖土司城以及祖先的墓葬，并负祭祀之责。

唐崖土司亦称唐岩土司、堂厓土司，设于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隶属于施州卫，为鄂西土家族著名土司，覃氏世袭。唐崖土司始封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鼎盛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废止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共历时元、明、清三代381年。从

首任土司覃启处送始，至末代未承袭的覃光烈止，唐崖覃氏共沿袭17代，中央政府认可的土司共存在16位，职级历长官司、千户、安抚司、宣抚司等多个等级，以长官司为主，属于较低级别的土司。

唐崖覃氏的族属，一度有蒙古族之说，后

鄂西土司众多，但仅唐崖土司筑有城。唐崖《覃氏族谱》记载，明朝廷为表彰覃鼎参与平定奢崇明叛乱，同意其建立治所，即唐崖土司城，并敕建“荆南雄镇”牌坊。



经调查，认定为土家族。覃姓为鄂西土家族传统大族。根据各支覃氏族谱记载，覃氏同宗同族。明人童昶《拟奏制夷四款》中亦有明确说明：“施卫所属田、覃二姓，当宋元未分之前，其势甚盛，故屡为边患。自国朝永乐以来，二氏子弟分为十四土司，传之后世”。《中华覃氏志·湖北卷》卷三《湖北覃氏人物》，更对其始祖覃启处送的生平进行了详细介绍，称其实名“覃化毛”，为鄂湘主流覃氏公认始祖覃汝先的曾孙，“普诸三子。为人刚果沉毅，勇武多力……奉长兄世袭镇国大元帅覃尔毛之命，领兵三千，攻打马化龙取得唐崖五峒地，置唐崖军民千户所，以化毛为千户。化毛治理唐崖系仿仲兄散毛抚蛮仁政，深得苗蛮之信任与诚服，使蛮民得以安居乐业，蛮民感其恩德，称化毛为‘启处送’（蛮语，意为上天赐予的仁主），覃化毛为唐崖始祖。”

摄影：马艳丽

鄂西土司众多，但仅唐崖土司筑有城。《万历湖广总志》明确指出“施州卫所属各土官，俱各寨居”，即使被雍正帝称为最为富强的容美土司，其统治中心的中府虽“司治五门”，然亦“无城有基”。唐崖土司传袭至十二世祖覃鼎时，势力发展至顶峰，因征西蜀升都司佥事兼宣抚司宣抚使。

天启元年（1621），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发动叛乱，先后攻占重庆、遵义等地，建国号“大梁”，并一度包围成都。后来，在四川巡抚朱燮元的组织下，历时两年多，这场战乱被平定。其后，崇明父子长期客居水西，依附于安邦彦。崇祯二年（1629）八月，奢崇明在“永宁之战”中兵败被杀。这就是明末著名的“奢安之乱”。

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朱燮元大量招用西南土司军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石柱宣慰使秦良玉等。唐崖土司也是平叛参与者，覃国安说，

按照唐崖《覃氏族谱》记载，明朝廷为表彰参与者唐崖土司覃鼎的武功，不但将其升为宣慰使（实为宣抚使），而且同意其建立治所“大方平西将军帅府”即唐崖土司城，并敕建“荆南雄镇”牌坊。

由于覃鼎长期在外征战，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习俗，其夫人田氏实际主持了建造工作。田氏实名田彩凤，为“龙潭安抚田氏女也。相夫教子，皆以忠勇著一时。夫鼎，于天启七年故，子宗尧袭职，颇肆行不道，田氏绳以礼法。迨尧奉调赴荆州剿流寇，峒事悉赖主持，内则地方安谧，外则转输无乏。未几，

### 明朝廷为表彰唐崖土司覃鼎的武功，不但将其升为宣慰使（实为宣抚使），而且敕建“荆南雄镇”牌坊。

宗尧死事，弟宗禹承袭，朴勇亦如其父。田乃优游以乐余年，性好善乐施，尤喜奉佛，尝朝四川峨眉山，随侍奴婢百余人，沿途皆为择配。归里后，创建大寺堂、牌楼、街道，焕乎一新，至今犹为邑中石迹云。”

刚建成时，该城共有三街十八巷36个院子，气势十分宏大。衙署区出土正对建筑群“四正”方向有“十字刻”柱础，可以确认唐崖土司城的建造，有十分缜密的规划与设计。

关于该城主体格局建造时代，覃国安说，唐崖《覃氏族谱》明确记载：田太祖自峨眉山回司后，“引囡峒主覃杰会同创造大寺堂、张王庙……创造寺观、牌楼、街道”。同时，根据“荆南雄镇”牌坊匾额前后部铭文“钦差总督四川兼湖广荆、岳、郧、襄、陕西汉中等府军务策授总粮餉巡抚四川等四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乃金郡御使朱燮元为湖广唐崖司征西蜀升都司金书兼宣抚司宣抚使覃鼎立 天启四年正月吉

旦”，结合考古学年代判定，城内的遗存主要集中于明代中后期，现有布局为一次性规划、营建。因此，可以确认，唐崖土司城在明天启、崇祯年间形成现有格局。

唐崖土司城作为唐崖覃氏土司的治所，是14~18世纪唐崖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汇集了城市聚落、家族墓地等多种社会生活载体，并依托周边的山形、水势构成一道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整座城市坐西朝东，背山面水，四周有城墙围合。城内功能设施完善，格局清晰，由一条南北向主干道、三横三纵的次干道以及数十条巷道形成的道路系统，分割为数十个院落，位于主干道中段、城址中心位置的大型院落即衙署区，是土司处理政务与生活的地方。城内还设有大寺堂、营房、检阅台、“御花园”、万兽园、杀人台、引水渠、水井等宗教、军事、娱乐、司法、生产生活设施。城外有码头、桥梁、瞭望台等附属设施。

由此可见，唐崖土司城在功能上布局完整、合理，所以历来被民间称为“土司皇城”，体现了其在土司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清雍正十三年(1735)，唐崖随忠峒等十五土司自请“改土归流”，领地并入新设立的咸丰县，唐崖土司举家迁往千里之外的汉阳，土司城逐渐废弃。清人冯永旭《唐崖司》咏叹：

烟树苍茫望里分，当年歌鼓寂无闻。  
惟留废苑埋荒草，但见空山走白云。  
古木寒鸦元武寺，斜阳衰柳土司坟。  
千秋凭吊情何急，况听哀猿又叫群。

跟全国其他地方的古遗迹一样，土司城也屡遭破坏。覃国安说，“学大寨”时，城墙的外包石和遗址内建筑的基础石，都弄去垒梯田和堡坎了。慢慢的，遗址也就被一块块水田和旱地所淹没。随着一幢幢民房，特别是砖混结构，杂乱无章的民居的出现，唐崖土司皇城的风貌也就难觅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保护工作的推进，遗址内石构的“荆南雄镇”牌坊、土王墓和张王庙石刻等主要遗存，上、中、下三街



**唐崖土司墓地** 唐崖土司城内东部的“官坟山”有第二代土司覃值什用和第十二代土司覃鼎夫妇的墓葬。改土归流后，部分后裔留守祖先墓葬，至今土司二十三代后裔覃国安仍时常上墓地拔除杂草。

和三条主要下河道为主的路网格局和城墙为代表的防御体系得到完好保存，1992年、2006年，先后由湖北省政府、国务院公布为省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揭开唐崖土司城神秘的面纱，2011年，在古文献、古建筑和城市规划学专家配合下，考古机构正式对其唐崖土司城进行发掘，现已基本掌握了唐崖土司城址的范围、边界、格局、功能分区和城墙、巷道、衙署区、院落、排水系统的位置、结构和修筑方式。专家发现，在唐崖土司城建造过程中，建造者不仅充分考虑了防御要求，而且注重吸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成熟经验，在建设选址中，将周边的山形与“四象”结合，将城市背依的山命名为玄武山，将

陈飞为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负责人，挂职咸丰县副县长，专职负责唐崖土司城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摄影：艾绍强

对面的山命名为朱雀山，将左右两侧的山分别命名为青龙山和白虎山。土司衙署布局严格采用中轴对称式，其前设置高大的“荆南雄镇”坊，充分体现了土司对中央国家的认同。

在唐崖土司城内，专家们不仅发现确认了大量土司时期的遗存，而且发掘出土大量文物。既有工艺精湛、等级较高的建筑构件，也有产自景德镇官窑的精美瓷器，还有彰显土司等级和战功的印章。

目前，唐崖土司城周边的历史风貌已逐步得到恢复和巩固。通过唐崖土司城的建造历史，以及本身文化符号所反映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出土司制度的特征既有自上而下体现中央王朝要求的方面，又有基于少数民族自身统治和传统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多民族地区管理理念。□